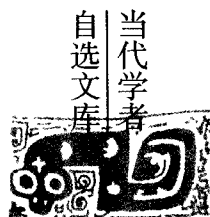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袁行霈
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袁行霈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袁行霈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12

ISBN 7-5336-2188-3

I. 当… II. 袁… III. ①袁行霈-文集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240 号

责任编辑:唐元明

装帧设计:黄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插页:1

印 张:20

字 数:440 000

版 次: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 000

定 价:30.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



◎ 作者近照

出版说明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数千年的生成、拓展、吸纳、融合和嬗变,熔铸了一座座巍峨耸立的学术丰碑,汇聚了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可谓光耀千古,泽被万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条件、氛围大有改善,此间虽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当代学者们依然凭其不屈的人文精神,孜孜矻矻,勉力奋耕,创造出了不少无愧于历史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更如春际的原野,生机勃勃,满目葱茏,佳花异卉,令人流连,真正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难得盛景。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学术精华,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尽自己些微的心力,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使中华民族的学术之薪、智慧之火,燃烧更旺,烛照更久远!

鉴此,我社郑重推出这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本套书选收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著名学者具有

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中的重要章节,旨在总结和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之精华、学术繁荣之盛况,使优良的学术传统、严整的学术规范得以承传光大,使一代学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新的面貌进入 21 世纪以至更远的时代。

为能更好地反映每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风貌,我们特请作者自选文稿,撰写自序、自传和主要著作目录,力求使读者能够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学者们的学术世界,领略其学术精义,了解其研究方法,感受其思想和文字的魅力。

梁任公有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我们深信,当代学术将以其特有的底蕴、卓然的风采广为流布,嘉惠学林,裨益于后世。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

自序

本书选录我 1979 年以来发表的一部分论述。1979 年我发表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言意与形神——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论文,标志着我的研究范围已不限于古典诗词,而扩大到其他领域。此后从事研究的眼光和方法,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借助史学、哲学、宗教学、语言、艺术学、心理学等等与文学相关的学科,在 multidisciplinary 的交叉点上,寻找新的研究课题。我把这种方法称之为综合研究。1978 年我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横通与纵通》,借用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用过的“横通”这个词,赋予它新的意义,表达我上述的看法。本书中所选的《言意与形神——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陶渊明的哲学思考》、《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等论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我常向学生讲做学问的体会:一个人不要只有一个阵地。如果只想守住一个阵地,也应在这个阵地之外另开辟一些回旋的余地,供“游击”之用。我的研究范围偏重于六朝诗、唐诗、宋词、文言小说,同时也在文学批评史特别是诗学史上下过一番功

夫。把面铺开来,容易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譬如,我因为对唐诗和宋词都做过研究,所以很自然地注意诗和词这两种体裁之间的关系,这才有了《长吉歌诗与词的内在特质》这篇论文;因为注意文学批评,才有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这篇论文,以及两位学生和我共同撰写的《中国诗学通论》这部书。

就诗词这个研究领域而言,我既尝试着开拓一个面,也努力深入一个点。

在面上我偏重于诗歌艺术的研究。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诗歌艺术方面有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和规律,一些诗学的理论和范畴也有待于结合诗歌创作加以阐述。这项研究前人虽然做了一些,但是不够系统。特别是将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还比较薄弱。我在“文革”以前已经有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想法,并发表过论文,“文革”期间中断了。1977年才又重新拾起来,1979年结合讲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门专题课,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在此后的几年里陆续发表,后来编成《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于1987年出版。我是想摸索一条道路,进入诗歌艺术的堂奥。我总结出“言”、“意”、“象”、“境”等几个范畴,找出其间的关系,并从人格、语言、意境等方面解释“风格”的形成。又从诗歌艺术史的角度,考察了自屈原到陆游共十四位诗人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力求将诗人的人格与风格,诗歌主张和诗歌艺术,艺术渊源与艺术创新,互相沟通起来加以研究。此书发行十年后,于1997年增订再版,诗歌艺术的研究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书中收录的有些论文就是从这部书中选出来的。

在点上,我选了陶渊明。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

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典型,又是士大夫精神上的家园,他为后代的士大夫筑起一个精神上的“巢”,一道精神上的“屏障”,使他们求得内心世界的安宁。研究陶渊明的意义已经超出诗歌研究的范围,而进入哲学史、士大夫史的范围了。这是文化史研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基于这种考虑,我不仅研究陶渊明的诗,还研究他这个人,这就难免对其生平进行考证。而陶渊明生平中的谜实在太多了,陶集的版本又非常多,陶集的异文也不少,我必须做版本、校勘方面的基础性工作。本书所收的《陶渊明享年考辨》一文,可以代表我在陶渊明考证方面的努力。

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是在“文革”期间进行的,“文革”期间我先后在工厂和五七干校劳动了将近两年,回校以后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便选了一部和政治根本不沾边的《山海经》来浏览。浏览中发现了问题,于是进一步研究,便写了《山海经初探》。“文革”结束后,许多学术刊物恢复出版,我想发表这篇文章又缺乏自信,便向顾颉刚先生求教,在他的鼓励下才投稿给《中华文史论丛》,在1979年的第三辑上发表。不久,又在《文史》上发表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并按照这篇文章提出的设想,请人与我合作共同编出《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于198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文言小说方面本来还计划做一系列的考证工作,后来因为教学偏重在诗词方面,便放松了那个计划。而今文言小说的研究正在突飞猛进,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就这个领域的问题发表新的意见了。

从1995年开始,我承担了国家教委规划的《中国文学史》的主编工作,并亲自撰写了一些章节。本书收入了其中的两篇绪论,以及讲陶渊明的一章。从中可以看出我最近对文学史的思考。

趁着编选这部文集的机会,我回顾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和研究成绩,成绩是相当贫乏的。我愿在有生之年不断努力,做得更多些、更好些。

文集的编选,多亏傅刚博士协助。哪篇该收,哪篇不该收,都参考他的意见。他的水平高,做为旁观者又会比我本人清醒些。文章的复印、校勘,与出版社联系,也多亏他帮助,谨致谢忱!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唐元明同志一再督促我编辑此书,并允许延迟交稿,也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8年4月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目 录

自 序·····	1
《山海经》初探·····	1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	37
言意与形神	
——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	57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	88
屈原的人格美及其诗歌的艺术美·····	120
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	147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168
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185
以赋为词	
——清真词的艺术特色·····	208
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222
温词艺术研究	
——兼论温韦词风之差异·····	239
从《文选》所选诗歌看萧统的文学思想·····	256
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264

中国文学的类别·····	280
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	308
陶渊明与魏晋风流·····	338
陶渊明的哲学思考·····	364
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	392
陶渊明享年考辨·····	418
陶渊明论·····	449
长吉歌诗与词的内在特质·····	475
百年徘徊	
——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	497
在沉沦中演进	
——试论晚唐诗歌创作趋向·····	521
关于中国诗学的几个问题	
——《中国诗学通论》绪论·····	541
中国大陆唐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553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	572
关于中国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603
 作者小传·····	 629
主要著作目录·····	631

《山海经》初探

一、《山海经》的篇目和时代

在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史记》：“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汉书·艺文志》于《数术略·形法家》之首列《山海经》十三篇。《汉志》采自《七略》，其中数术诸书是成帝时太史令尹咸校定的。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即刘歆）又校上《山海经》十八篇，篇数与《汉志》不同。晋郭璞在刘秀校本的基础上，加以整理注释，并著《山海经图赞》二卷，这就是今传《山海经》的祖本。

《山海经》今传本十八卷，三十九篇。包括：南山经一卷三篇，西山经一卷四篇，北山经一卷三篇，东山经一卷四篇，中山经一卷十二篇，是为《五藏山经》，简称《山经》。又，海外南、西、北、东经各一卷一篇，海内南、西、北、东经各一卷一篇，是为《海经》。此外，还有大荒东、南、西、北经各一卷一篇，海内经一卷一篇。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史记》和《汉书》都没有说明。刘秀校上《山海经》表文始明言是禹、益等所作:“《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此后,王充也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①但王充只是根据刘秀立说,没有新的论证。赵焘说:“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②所谓“召神而问”云云,显然又是赵焘的傅会。

《山海经》并非禹、益所记,前人已有论辨。书中记载禹、益以后之事甚多,如海外西经记夏后启事,大荒西经记汤伐夏桀,大荒东经记殷王子亥,海外南经记周文王葬所。中次三经称“禹父”,中次十二经引“禹言”。以及书中屡言产铁,多有秦汉郡县地名等等,都是明证。颜之推认为“皆由后人所属,非本文也”^③,但如此多的段落都用后人属入来解释,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山海经》虽然不是禹、益所记,但其材料来源必定很早,起先只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益演变,构成系统,最后才写成文字。正如啖助所说:“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④如果大禹治水的传说确有历史依据的话,那么《山海经》材料

的源头，未尝不可追溯到这荒远的时代。因为这项治水工程足以引起上古人山川地理的注意，使他们突破自己部族狭小的生活领域，接触较广阔的天地，认识种种前所未闻的奇事异物，并开始具有初步的地理观念和地理知识。《山海经》关于山川地形和各种物产的记载，都是极原始的，带有许多神话的成分，与实际相去甚远，这正符合远古时代的认识水平。

有人认为《山海经》是根据图画记述的。朱熹说：“《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九歌》、《天问》皆其类。”^⑤胡应麟遂据朱说，认为“经载‘叔均方耕’，‘灌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记事之词大异。……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⑥杨慎说得更肯定：“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⑦毕沅又进而断言：“《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十三篇中，海外、海内经所说之图当是禹鼎也，大荒经以下五篇所说之图当是汉时所传之图也。……据《艺文志》，《山海经》在形法家，本刘向《七略》，以有图故在形法家。”^⑧以上朱、胡、杨、毕诸家都认为《山海经》是《山海图》的文字说明，这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绘制山川地图的记载，《管子》有地图篇；《吴孙子兵法》附图九卷，《齐孙子》附图四卷^⑨；燕国有督亢地图^⑩。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汉初长沙一带地形图，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地图。以此推测，在《山海经》成书的时代，有一种图画绘载山川道里、神人异物，以辅助神话传说的记忆，并不是不可能的。《山海经》里有少数文字确实类似图画的说明，如“叔均方耕”之类。这证明在

《山海经》中，可能有一部分内容是根据上古流传下来的某种图画记录成文的。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说整部《山海经》都是图画的文字说明。很难想像，有一套图画可以把《山海经》如此庞杂的内容包罗进去。我们现在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山海经》成书以后绘制的插图。北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最早著录《山海经图》十卷，是舒雅于宋咸平二年据梁张僧繇《山海经图》重绘的，张图距《山海经》成书已晚了七八百年^①。郭注有“画似仙人”、“画似猕猴”、“在畏兽画中”等语^②；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也有“流观山海图”的句子。郭、陶所说的山海图早已亡佚，不可考其绘自何时。《后汉书·王景传》说：“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当时也许曾有山海经古图存在，但也不可考了。《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崑，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武帝所案古图书，据篇末赞语，是《禹本纪》和《山海经》。如果所谓古图书是既有文又有图的话，那么武帝时已有一部《山海经图》了。但这已在《山海经》成书之后，此前是否有一套完整的海山图，毕竟是一个疑问。

至于说《山海经》出自禹鼎图，就更可疑了。关于禹鼎图，《左传》宣公三年载：“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但据史学界的一般的说法，中国青铜器的使用最早在殷，夏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似乎还没有铸鼎的技术，王孙满的话并不可靠^③。我们今天看到的商周古鼎，上面所铸怪兽图案包含的故事内容是比较简单的。如“周鼎著饕

饗，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周鼎著倮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⑩这些简单的图案是根据当时流行的传说铸制的，只取其一方面的教训意义。像王孙满所说的那种百物皆备的鼎图，未必曾经有过。就目前的资料看来，《山海经》出自禹鼎图的说法，不过是臆断。

那么，《山海经》究竟成书于何时呢？

《山经》与《海经》各成体系，是不同时代的两部书，应分别论述。《山经》记述海内各方名山大川，动植物产，祲祥怪异，祭祀所宜，写定的时代较早，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⑪。主要论据如下：五行之说盛行于汉代，汉代载籍几乎无不沾染五行色彩，而《山经》虽记述了南西北东中五方之山，却未与五行相配，可见是汉以前的著作。《山经》的地理观念比《禹贡》更原始，譬如，它想像中国四周被海包围，而《禹贡》则只在东方言海，这说明《禹贡》已更接近于实际。如果肯定《禹贡》是战国末年的作品，那么，《山经》必完成于战国中期以前。这是它的下限。《山经》中多次说到铁，如“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铍之所起也。”可见当时已经知道使用铁制的武器。《山经》的语言比较晓畅，不像春秋以前的典籍那样古奥，显然是运用战国以后新的文学语言写成的。综合以上各点，大致可以肯定《山经》是战国初期或中期的作品。《海经》记载海内外各殊方异国的传闻，夹杂大量古代神话，写成的时代较晚。其中多有秦汉郡县地名；又为《淮南子·地形训》所本^⑫，可以肯定是秦或西汉初年的作品。

大荒经以下五篇保存神话最多。它们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卷首《山海经篇目考》中说：山